

DOI: 10.13718/j.cnki.xdzk.2021.09.011

产业扶贫视角下农户生计资本影响因素分析

杨悦^{1,2,3}, 马超群^{1,2,3}, 徐和平⁴,
员学锋^{1,2,3}, 邵雅静^{1,2,3}

1. 长安大学土地工程学院, 西安 710064; 2. 陕西省土地整治重点实验室, 西安 710064;
3. 长安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 西安 710064; 4. 长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西安 710064

摘要: 产业扶贫是激发农户内生动力的关键, 探究其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对于提高农户收入, 巩固脱贫攻坚成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构建贫困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 通过似不相关回归模型, 分析产业扶贫措施对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结果表明: 享受产业扶贫政策农户的各项生计资本均高于未享受过产业扶贫政策的农户; 未享受产业扶贫政策农户中各类型农户的社会资本较为匮乏, 明显低于其他四项资本。产业帮扶措施对贫困农户的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关键词: 生计资本; 产业扶贫措施; 似不相关

中图分类号: F323.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9868(2021)09-0092-10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Farmers' Livelihood Capit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YANG Yue^{1,2,3}, MA Chaoqun^{1,2,3}, XU Heping⁴,
YUAN Xuefeng^{1,2,3}, SHAO Yajing^{1,2,3}

1. School of Land Engineering,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China;

2. Shaanxi Key Laboratory of Land Consolidation, Xi'an 710064, China;

3. Institut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China;

4.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China

Abstract: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is the key to stimulating the endogenous motivation of farmers. Exploring its impact on farmers' livelihoo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winning the battle against poverty and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nalysis,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 poor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capital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analyzes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measures on poor rural households'

收稿日期: 2020-07-26

基金项目: 陕西省土地整治重点实验室基金项目(211927190123); 长安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300102270207)。

作者简介: 杨悦,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农村贫困化与乡村振兴研究。

通信作者: 员学锋, 教授。

livelihood capital through a seemingly uncorrelated regressio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various livelihood capitals of farmers who benefit from the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a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farmers who do not; that the social capital of all types of farmers who do not enjoy the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is relatively scarce, which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other four livelihood capitals; and that industrial assistance measure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natural capital, human capital, social capital and financial capital of poor farmers.

Key words: livelihood capital; industrial support measure; seemingly uncorrelation

产业扶贫是贫困地区帮助农户本地就业、实现增收的主要途径,是贫困地区改善区域发展不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1-2]。此外,乡村振兴战略将“产业兴旺”放在乡村振兴工作的首要位置,表明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产业发展仍是巩固提升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成效、实现经济增长的长效和根本之计。近年来随着各项产业扶贫政策的推出与实施,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因产业扶贫项目的短期化与同质化等问题使得产业扶贫很难充分发挥其作用,导致贫困农户的实际参与度低、增收受限。农户作为产业扶贫的重要参与者与受益者,其在产业扶贫过程中是否真正得到发展,是对产业扶贫成效的检验,同时也是今后区域脱贫攻坚成效巩固提升和乡村振兴重点关注的问题。基于此,深入了解当前贫困地区产业扶贫的实际作用与效果,对于提高农户收入,促进产业扶贫与产业兴旺的有效衔接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产业扶贫的相关研究近年来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关于产业扶贫模式的研究^[3-5],根据实际调研数据,对该地区可复制并推广的典型产业扶贫模式进行凝练总结和提升;二是关于产业扶贫实践困境的研究^[6-8],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对于当前我国在产业扶贫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与存在的问题进行探究,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三是产业扶贫成效评价研究^[9-11],通过构建指标体系,采用模型测度产业扶贫绩效。关于产业扶贫对农户的影响多是探究产业扶贫对农户收入影响,而关于产业扶贫措施对农户整体状况影响程度的研究较少,此外,已有研究发现贫困农户的生计资本多处于较低水平,其中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最为明显^[16-17]。为改善与提升农户生计状况,加强产业扶贫后续帮扶的有效性和精准性,提供产业扶贫与产业兴旺有效衔接的理论依据,本研究结合甘肃省皋兰县实地调研所获取的农户生计相关数据,对县域农户生计资本状况进行测算评估,基于产业扶贫视角,分析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因素。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产业扶贫作为开发式扶贫的一项重要措施,旨在通过鼓励、扶持贫困农户发展特色产业实现脱贫,是我国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的重要方式^[18]。产业扶贫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户原有的生产经营方式,可以提升农村贫困户可持续生计能力,同时也对农户生计资本的积累以及组合状态的改变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在产业扶贫过程中针对不同群体的实际情况,则会采取不同的扶贫措施,是否每一项扶贫措施都可以促进贫困户提升可持续生计能力,则需要进一步实证检验^[19]。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的实施意见,结合皋兰县产业发展情况、产业扶贫的组织模式以及主要的利益联结机制,选取6项扶贫措施探究产业扶贫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分别是土地流转方式加入合作社、以务工方式加入合作社、以财政资金或扶贫小额信贷折股入社、免费发放种苗或种畜、发放产业发展现金补助和提供各类技术服务。

1) 加入专业合作社(以土地流转方式)对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部分缺乏劳力的贫困农户为改变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零星分散、市场信息不灵等问题,把家庭承包土地的经营权采取入股的方式流转给专业合作社。农户将土地流转到合作社在增加自身收入的同时有利于农户自身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农户生计方式的转变。因此,以土地流转方式加入专业合作社,能够促使贫困农户选择更合理的生计方式,实现

收入来源的多元化.

M1: 加入专业合作社(以土地流转方式)与未加入专业合作社的贫困户生计资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即加入专业合作社(以土地流转方式)与贫困农户生计资本呈正相关.

2) 加入专业合作社(务工)对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 农民加入合作社的运营, 在掌握一定的专业技能、增加自身收入的同时也为合作社的壮大与发展提供了人力支持^[20]. 因此, 以务工形式加入专业合作社, 能够促使农户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形成与积累, 能够有效提升农户自身发展能力.

M2: 加入专业合作社(务工)与未加入专业合作社的贫困户生计资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即以务工形式加入专业合作社与贫困农户生计资本呈正相关.

3) 加入专业合作社(财政资金或扶贫小额信贷折股入社)对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 对于丧失劳动力、外出务工或无地种植、无条件养殖的贫困户, 政府通过引导和支持他们将扶贫资金和小额信贷进行折股量化作为出资入股合作社. 以资金入股的方式加入合作社是农户实现增收的方式之一, 收入结构多元化和家庭收入的显著提升使得脱贫农户在因病返贫、因灾返贫等因素的冲击下仍能维持正常开支, 有效实现风险分解与控制, 提升生计可持续性水平^[21].

M3: 加入专业合作社(财政资金或扶贫小额信贷折股入社)与未加入专业合作社(财政资金或扶贫小额信贷折股入社)的贫困户生计资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即以财政资金或扶贫小额信贷折股加入专业合作社与贫困农户生计资本呈正相关.

4) 免费发放种苗或种畜与贫困农户生计资本. 生产和发展资金短缺是贫困农户普遍面临的现实问题, 这也成为制约贫困地区合作社和贫困农户发展的关键问题. 贫困农户无足够的资金购买较好的种苗和种畜禽, 配备较好的种养条件, 是导致农副业生产回报少、生产效率低的主要原因^[21]. 因此, 免费发放种苗或种畜对于贫困户发展产业, 实现自我发展, 改善贫困现状具有重要意义.

M4: 免费发放种苗或种畜与未得到种苗或种畜的贫困户生计资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即免费得到种苗或种畜与贫困农户生计资本呈正相关.

5) 产业发展现金补助与贫困农户生计资本. 产业扶贫政策在考虑到当地资源禀赋的同时, 鼓励贫困农户自主发展产业, 特色产业的发展往往更易适应市场需求, 进而产生良好的经营效益, 这也为自然资源较为匮乏的贫困地区提供了发展农业产业化的途径, 从而增强脱贫农户参与产业扶贫的意愿和积极性^[22]. 因此, 产业现金补助对于贫困户参与产业扶贫、积极发展产业具有积极作用.

M5: 产业发展现金补助与未得到产业发展现金补助的贫困户生计资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即得到产业发展现金补助与贫困农户生计资本呈正相关.

6) 提供各类技术服务与贫困农户生计资本. 针对有发展意愿但缺乏技术的农户开展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与指导, 可提高产业生产效率, 并为贫困农户自主发展增强自信心, 进而提高其生计水平. 因此, 技能培训能够促使农村人力资本的形成与积累, 有效提高贫困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 是实现反贫困的有效途径.

M6: 提供各类技术服务与未得到各类技术服务的贫困户生计资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即得到各类技术服务与贫困农户生计资本呈正相关.

基于此, 本研究重点关注产业扶贫过程中不同帮扶措施对贫困户的影响机制, 即产业奖补、参与专业合作社和入股合作社、企业分红等对其可持续生计的影响, 为脱贫攻坚成效巩固提升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依据.

2 研究区域概况

皋兰县位于北纬 36°05'至 36°50'、东经 103°32'至 104°22'之间, 地处甘肃中部, 是兰州市的郊区县, 海拔在 1 411~2 445 m 之间, 县城海拔 1 650 m, 地势西北高、东南低. 皋兰县系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

困县之一, 2018 年皋兰县下辖 4 镇、3 乡, 共有行政村 71 个、社区 3 个, 其中贫困村 32 个, 总人口为 18.084 1 万人, 包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7 795 户 27 838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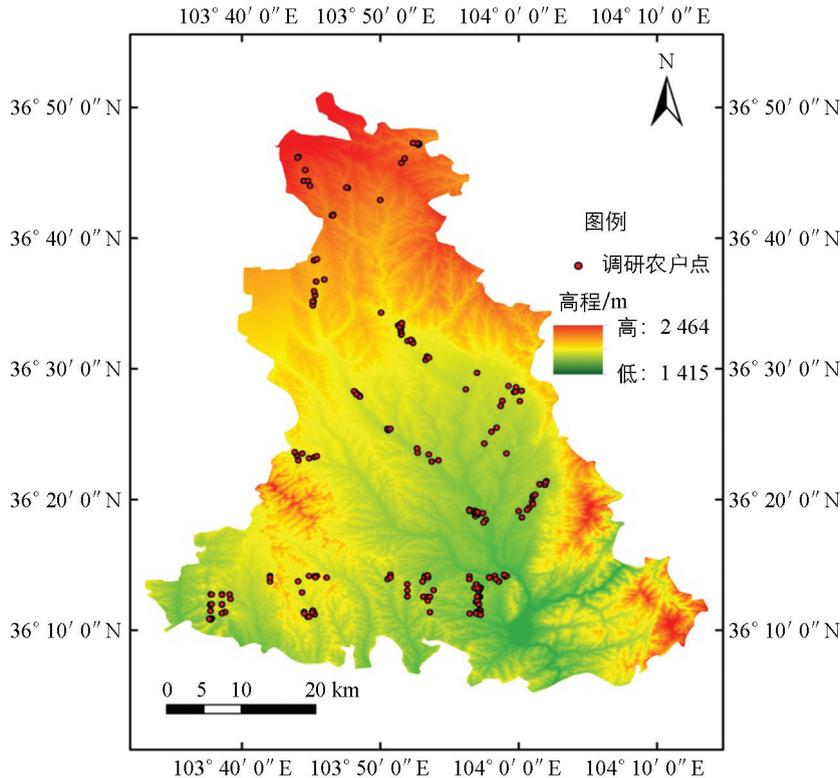


图 1 调研农户分布点

3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

为获取皋兰县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相关数据, 调研组于 2018 年 7 月—8 月在甘肃省皋兰县调研。调研基于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PRA), 主要采用半结构化访谈和问卷调查法获取第一手数据, 此外, 就不确定的问卷信息与村级、乡镇级、县级进行核实, 以确保数据准确性。具体发放问卷时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 实地共发放问卷 700 份, 合计回收 683 份, 含无效问卷 42 份, 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641 份, 问卷有效率达 93.85%。贫困户构成情况见表 1。问卷的主要内容包括农户的基本情况, 拥有的自然资源、牲畜量、产业扶贫政策享受情况以及收入构成等。在实地调研中发现, 农户享受的帮扶措施主要有 6 类(表 2): 加入专业合作社(以土地流转方式)、加入专业合作社(务工)、加入专业合作社(财政资金或扶贫小额信贷折股入社)、免费得到种苗或种畜、得到产业发展现金补助和得到各类技术服务。受访贫困户中, 471 户参加了扶贫产业或者享受了产业扶贫政策, 占比为 73.48%, 170 户表示没有得到相应的产业扶贫政策, 占比为 26.52%。

表 1 贫困户构成

贫困户类型	户数/户	百分比/%
一般贫困户	395	61.62
低保贫困户	230	35.88
五保贫困户	16	2.50

表 2 贫困户参与产业扶贫的基本情况

参与措施	户数/户	百分比/%
加入专业合作社(以土地流转方式)	36	5.62
加入专业合作社(务工)	32	4.99
加入专业合作社(财政资金或扶贫小额信贷折股入社)	32	4.99
免费得到种苗或种畜	322	50.23
得到产业发展现金补助	196	30.58
得到各类技术服务	306	47.74

3.2 指标选取与变量选择

3.2.1 生计资本评价指标选取与评价体系构建

(1) 指标选取

本文在选取农户生计资本测算指标时,依据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于2000年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23],结合已有研究成果^[24],立足于皋兰县自然禀赋、社会经济条件和农户生产生活状况,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5个方面共选取了19项评价指标(表3),对每一户展开调查。

表 3 农户生计资本指标和指标说明

指标特征	单项评价指标	符号	指标说明	权重
自然资本	人均耕地面积	N1	人均耕地承包面积/($\text{hm}^2 \cdot \text{人}^{-1}$)	0.014 9
	人均林地面积	N2	人均林地承包面积/($\text{hm}^2 \cdot \text{人}^{-1}$)	0.103 5
	经济作物种植比例	N3	经济作物种植占耕地面积比重/%	0.032 0
物质资本	人均牲畜量	P1	人均拥有的牛、猪、羊/(头· 人^{-1})	0.041 2
	是否通自来水	P2	自来水为1,其他为0	0.002 6
	房屋结构	P3	钢混结构为1,砖混结构为0.75,砖木结构为0.5,彩钢房为0.25	0.063 9
人力资本	户籍人口数	H1	家庭人数/(人· 户^{-1})	0.009 4
	劳动力人数	H2	家中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数/(人· 户^{-1})	0.010 3
	参加技能培训比例	H3	家中参加技能培训的人数占比/%	0.074 8
	家庭成员健康状况	H4	家中健康劳动力人数占人口比重/%	0.033 3
社会资本	外出务工活动人数	S1	家中是否有人通过亲戚介绍或政府联系外出务工活动/(人数· 户^{-1})	0.187 5
	本地工作人数	S2	家中是否有人通过亲戚介绍或政府联系本地务工活动/(人数· 户^{-1})	0.163 1
	是否加入合作社	S3	参加合作社为1,未参加合作社为0	0.145 6
金融资本	获得信贷的机会	F1	获得信贷为1,未获得信贷为0	0.018 9
	家庭纯收入	F2	家庭纯收入/[元·(户·年) $^{-1}$]	0.045 5
	家庭人均纯收入	F3	家庭人均纯收入/[元·(人·年) $^{-1}$]	0.053 5

(2) 生计资本测算

贫困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完成以后,采用熵值法确定所选取指标的权重(表3),运用综合指数法测算农户的生计资本值^[26-27]。

$$L = \sum_{i=1}^5 \sum_{j=1}^n W_{ij} X_{ij} \quad (1)$$

式中: L 为生计资本值; W_{ij} 为第 i 类生计资本第 j 项指标的权重; X_{ij} 为第 i 类生计资本第 j 项指标的标准化值; n 表示指标数。

(3) 生计类型确定

参考文献[27]农户生计类型划分标准,将农户划分为纯农型、非农型、本地兼业型、外地兼业型。调查农户中外地兼业型最多,共308户,占比48.05%;纯农户共122户,占比19.03%;本地兼业型共108户,占比16.85%;非农型数量农户最少,103户,占比16.07%。

3.2.2 农户生计资本影响因素的变量选择

结合调研地的实际情况,本文将对贫困农户生计资本产生影响的各种潜在因素分为产业扶贫措施因素、家庭因素和社区因素3类,针对每一户开展调查具体变量的设置和描述性统计见表4^[28-29]。

政策因素包括农户是否参与产业扶贫措施以及参与政策的类型。本文参考当前皋兰县主要的产业扶贫措施,选取6个指标表示农户享受产业扶贫措施的情况,分别为农户以土地流转方式加入专业合作社、在合作社或本地企业务工、财政资金或扶贫小额信贷折股入社、免费得到种苗或种畜、得到产业发展现金补助和得到各类技术服务。

家庭因素主要从农户家庭基本情况进行选取,主要包括户主年龄、文化程度、家庭规模大小、家中在外务工情况、劳动力情况、负担比、健康状况以及家庭生计活动选择情况。

社区因素包含两个指标,分别为2018年农户所在村家庭年均收入情况和到镇上的距离。农户所在村的人均年收入水平代表着该村的经济状况;农户所在村到镇上的距离反映了农户到乡镇中心从事生产经营以及购买家庭生活用品的便利程度,会对农户的生计资本提升和转换产生重要影响^[27]。

表4 自变量设置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分类	变量名称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产业扶贫措施	以土地流转方式加入专业合作社	0	1	0.056	0.230
	在合作社或本地企业务工	0	1	0.050	0.218
	财政资金或扶贫小额信贷折股入社	0	1	0.050	0.218
	免费得到种苗或种畜	0	1	0.502	0.500
	得到产业发展现金补助	0	1	0.306	0.461
	得到各类技术服务	0	1	0.477	0.500
家庭因素	户主年龄/人	22	88	56.719	10.600
	户主文化程度	1	5	1.641	0.670
	外出务工人口数/人	0	5	0.986	0.916
	户籍人口数/人	1	10	3.998	1.525
	劳动力人数/人	0	6	2.178	1.148
	家庭中负担比	0	1	0.440	0.282
	家庭所有成员整体健康状况	0	1	0.759	0.243
	家庭从事各项生计活动的总数/万元	1	2	1.649	0.478
社区因素	家庭所在村人均年收入/万元	0.611	1.217	0.754	0.136
	家庭所在村到镇上的距离/km	1	43	14.015	11.758

3.3 研究方法

在参考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5种生计资本定义为被解释变量,通过建立5个方程来研究引起5项生计资本变动的影响因素,为避免各单项生计资本之间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导致各方程之间扰动项存在相关性,本文选取似不相关回归模型(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 SUR)对各单项生计资本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在Stata15中实现^[28]。建立系统方程模型如下:

$$P_j = \alpha_{ij} + \sum \beta_{ij} x_i + \epsilon_{ij} \quad (2)$$

其中: P 代表各单项农户生计资本值, α_{ij} 与 β_{ij} 为回归方程系数, x_i 为模型中的解释变量, ϵ_{ij} 为残差项。

4 结果与分析

4.1 农户生计资本量化结果

4.1.1 农户生计资本差异分析

从样本总体来看,皋兰县贫困农户的社会资本(0.034 4)和物质资本(0.033 2)相对较高,自然资本(0.024 7)次之,人力资本(0.014 8)和金融资本(0.015 5)相对匮乏(表 5)。

表 5 农户生计资本对比

生计资本类型	样本总体	享受政策农户	未享受政策农户	T 检验
自然资本	0.024 7	0.026 1	0.025 2	-0.489
物质资本	0.033 2	0.035 0	0.030 8	-1.531
人力资本	0.014 8	0.016 0	0.012 6	-2.826***
社会资本	0.034 4	0.042 8	0.012 1	-5.276***
金融资本	0.015 5	0.016 2	0.014 3	-2.097**

注:***,**, * 分别表示在 1%, 5%, 10% 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

本文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享受过产业扶贫措施的农户和未享受过产业扶贫措施的农户的各项生计资本进行对比(表 5)。通过对享受和未享受产业扶贫政策两类农户的对比发现,享受过政策的农户的各项生计资本水平均高于未享受政策的农户,社会资本最为明显。此外,享受和未享受产业扶贫政策的农户的社会资本均值在 1% 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产业扶贫政策包括农户以土地流转方式加入合作社、在合作社或企业中务工,这对于农户选择更多的生计方式以及扩大其社会关系网,进一步提高其生计水平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享受政策户人力资本(0.016 0)略高于未享受政策户,但相较于其他单项资本仍处于较低水平,表明产业扶贫政策中的技术服务对农户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具有一定的帮助。享受政策农户金融资本高于未享受政策户,以现金补助的方式鼓励农户发展种养殖业短期内可增加农户收入,长期来看对农户金融资本的增加帮助较小。享受政策户自然资本(0.026 1)和物质资本(0.035 0)高于未享受政策户自然资本(0.025 2)和物质资本(0.030 8),但未通过 T 检验。

4.1.2 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对比

各类型农户生计资本中(图 2),未享受政策户中农业型、本地兼业型、外地兼业型和非农型农户生计资本均低于享受政策户,尤其是农业型农户(0.089 8)和非农型农户(0.079 1),此外,未享受政策户各类型农户的社会资本明显低于享受政策户,这表明未享受政策户中的农业型、非农型农户生计资本较为缺乏,也预示着两类农户极易返贫,可通过产业扶贫措施帮助农户提高社会资本,促进农户内部的均衡发展。

4.2 农户生计资本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通过似不相关回归模型分析政策因素、家庭因素和社区因素包括的各项指标对农户各生计资本的影响程度,并重点研究产业扶贫措施对农户各项生计资本的影响,具体结果见表 6。

如表 6 所示,产业扶贫措施对农户的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具有显著作用,对物质资本的影响不明显。具体到各类帮扶措施,农户以土地流转方式加入合作社、免费得到种苗或种畜以及得到产业现金补助的帮扶措施对农户的各项生计资本无显著作用;在合作社或本地企业务工对农户的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对其他资本无显著影响;以财政资金或扶贫小额信贷折股入社对农户的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对其他资本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得到各类技术服务对农户的社会资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其他资本无显著影响。综合来看,不同类型的产业扶贫措施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存在着明显差异,以产业发展现金补助、发放种苗或种畜等直接的帮扶措施对于农户物质条件的改善、收入的增加有一定的影响,但对其生计水平的提高无较大帮助,而农户通过在合作社或企业中从事生产活动、学习职业技术对于农户生计资本的改善、内生动力的激发具有积极作用。

在家庭因素中,户主年龄对农户拥有的自然资本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对其他资本影响不明显;户主的

文化程度对农户的金融资本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说明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于农户摆脱贫困、增加收入具有正向作用; 家庭外出务工人员对自然资本有显著的负向作用, 以非农活动为主的农户, 其农地多为流转状态, 因此其自然资本相对较低; 生计多样性对农户的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生计多样性的选择对于农户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人力资源合理分配有着重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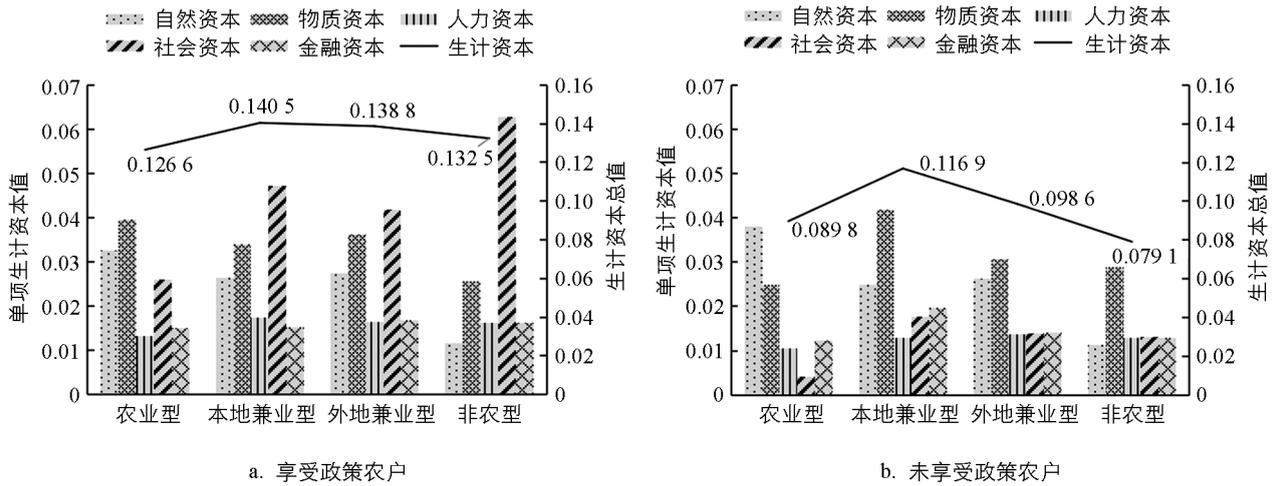


图 2 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对比

在社区因素中, 村内人均纯收入对农户的自然资本有显著的负向作用, 表明社会经济发展较高的区域其产业已形成一定的规模, 并且发展态势好成为农户土地流转的主要原因。农户家庭到镇上的距离对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表明距离区域内发达中心的远近程度是影响农户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重要因素, 距离商业中心越近, 农户的自然水平和人力水平越高。

表 6 生计资本影响因素似不相关回归结果

影响因素	自变量	自然资本	物质资本	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	金融资本
政策因素	以土地流转方式加入专业合作社	0.06	0.67	-0.72	—	0.46
	在合作社或本地企业务工	1.82*	-0.16	1.92*	—	-1.40
	财政资金或扶贫小额信贷折股入社企业	-0.84	1.01	0.81	2.42**	2.03**
	免费得到种苗或种畜	1.05	—	1.29	1.44	0.62
	得到产业发展现金补助	-0.27	0.41	0.86	1.51	0.12
	得到各类技术服务	-0.82	0.07	—	2.42**	0.75
家庭因素	户主年龄	2.29**	-1.25	-0.39	-0.91	-0.45
	户主文化程度	0.89	1.57	0.78	1.03	2.89***
	外出务工人员数	-1.75*	-0.09	1.35	0.86	-0.52
	户籍人口数	-0.28	-0.64	—	-0.76	1.41
	劳动力人数	-0.15	1.00	—	0.39	-0.48
	家庭负担比	-0.07	0.32	-0.05	0.56	-0.21
	家庭所有成员整体健康状况	-0.55	-3.55***	—	1.39	0.64
家庭从事各项生计活动的总数	3.32***	1.56	3.01***	0.19	1.36	
社区因素	家庭所在村人均年收入	-3.43***	-1.18	-1.17	-1.14	0.86
	家庭所在村到镇上的距离	8.18***	-1.21	2.16**	1.13	-1.56
	R ²	0.14***	0.04**	0.49***	0.38***	0.05***

注: ***, **, * 分别表示在 1%, 5%, 10% 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 由于物质资本中包含牲畜量、人力资本中包含得到技术培训、社会资本中包含是否加入合作社, 因此在影响因素分析中未包括以上指标。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自然、物质、人力、社会和金融 5 方面构建了贫困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综合指数法测算了农户生计资本值,通过似不相关回归模型重点探究了各项产业扶贫措施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 享受政策农户的生计资本均高于未享受政策农户,且两者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明产业帮扶措施对农户生计资本的提升是有效的,在后期乡村的发展过程中对农户的产业帮扶仍需注重。

2) 未享受政策农户中农业型农户(0.089 8)和非农型农户(0.079 1)生计资本明显低于其他类型农户,应及时关注两类型农户的家庭生产生活状况,避免其返贫。

3) 产业帮扶措施对农户的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具体帮扶措施表现为给予农户技术支持和鼓励农户到合作社务工、给予农户资金支持发展产业,此外,家庭因素和社区因素对农户的生计资本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影响。皋兰县需调整已有的扶贫机制,结合当地特色产业,包括当地红砂洋芋、高原夏菜、优质林果、畜禽养殖等,引进产业带动主体和扶持项目,发挥好当地龙头企业、合作社以及产业大户的引领示范作用,鼓励农户参与到产业带动主体的实际发展与运营中,为群众的长远发展以及持续发展打好基础,进而推动农村产业的发展,为乡村战略的实施奠定基础。

产业帮扶措施实施的精准性与有效性对于农户激发内生动力,促进增收,实现富裕具有推动作用,相较于已有研究而言,本文更关注产业扶贫措施对农户整体生产生活状况的影响,试图为产业帮扶与发展的可持续性、精准性提供依据。当前产业帮扶措施采取奖补措施与发展农户自身技能相结合的方式,意在提升农户自身的发展力,奖补政策短期内对农户收入的提升效果显著,其可持续性仍需进一步关注。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应进一步发挥已有合作社、龙头企业、产业大户等的作用,依托乡村特色资源,扩大产业规模,完善产业链,吸纳农户真正参与到产业发展中,以助力乡村的振兴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王超,刘俊霞.中国反贫困工作 40 年历史演进——基于 1979—2018 中国反贫困政策的量化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8(12): 2-18.
- [2] 陈文胜.论乡村振兴与产业扶贫[J].农村经济,2019(9): 1-8.
- [3] 黄承伟,叶韬,赖力.扶贫模式创新——精准扶贫:理论与贵州实践[J].贵州社会科学,2016(10): 4-11.
- [4] 孙久文,唐泽地.中国产业扶贫模式演变及其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借鉴意义[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4(6): 5-10.
- [5] 白丽,赵邦宏.产业化扶贫模式选择与利益联结机制研究——以河北省易县食用菌产业发展为例[J].河北学刊,2015,35(4): 158-162.
- [6] 张正岩,高延雷,王志刚.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合作社产业扶贫的实践困境与应对之策——以贵州省世行六期扶贫项目为例[J].农业经济,2020(2): 69-71.
- [7] 梁栋,吴惠芳.农业产业扶贫的实践困境、内在机理与可行路径——基于江西林镇及所辖李村的调查[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1): 49-57, 164.
- [8] 尤琳,魏日盛.“村党支部+合作社”产业扶贫模式:运行成效、实践困境与政策建议[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2(1): 1-10.
- [9] 杨照,张正尧.产业精准扶贫评价体系构建及研究——基于 14 个贫困县的调查[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8,39(3): 179-184.
- [10] 王立剑,叶小刚,陈杰.精准识别视角下产业扶贫效果评估[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28(1): 113-123.
- [11] 谢大伟,苏颖,赵亮,等.深度贫困地区易地扶贫搬迁产业扶贫模式与效果评价——来自新疆南疆三地州产业扶

- 贫的实践 [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1, 35(1): 8-13.
- [12] 刘卫柏, 于晓媛, 袁鹏举. 产业扶贫对民族地区贫困农户生计策略和收入水平的影响 [J]. 经济地理, 2019, 39(11): 175-182.
- [13] 巫林洁, 刘滨, 唐云平. 产业扶贫对贫困户收入的影响——基于江西省 1047 户数据 [J]. 调研世界, 2019(10): 16-20.
- [14] 胡晗, 司亚飞, 王立剑. 产业扶贫政策对贫困户生计策略和收入的影响——来自陕西省的经验证据 [J]. 中国农村经济, 2018(1): 78-89.
- [15] 李雨, 王全忠, 周宏. 产业帮扶对农户脱贫及减贫效果稳定性的影响——来自贵州毕节烟草种植计划调减的经验证据 [J]. 经济地理, 2019, 39(8): 168-176.
- [16] 邵雅静, 员学锋, 杨悦, 等. 黄土丘陵区农户生计资本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 1314 份农户调查样本数据 [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0, 34(7): 8-15.
- [17] 宁泽逵. 农户可持续生计资本与精准扶贫 [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6(1): 86-94.
- [18] 李博, 左停. 精准扶贫视角下农村产业化扶贫政策执行逻辑的探讨——以 Y 村大棚蔬菜产业扶贫为例 [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42(4): 66-73, 190.
- [19] 王振振, 王立剑. 精准扶贫可以提升农村贫困户可持续生计吗? ——基于陕西省 70 个县(区)的调查 [J]. 农业经济问题, 2019, 40(4): 71-87.
- [20] 李如春, 陈绍军. 农民合作社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19(2): 53-59, 91.
- [21] 宁静, 殷浩栋, 汪三贵, 等. 易地扶贫搬迁减少了贫困脆弱性吗? ——基于 8 省 16 县易地扶贫搬迁准实验研究的 PSM-DID 分析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8, 28(11): 20-28.
- [22] 李玉山, 陆远权. 产业扶贫政策能降低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吗? ——政策效应评估与作用机制分析 [J]. 财政研究, 2020(5): 63-77.
- [23] DIF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 [R].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IFD, 2000.
- [24] 马婷, 王勇, 廖和平, 等. 生态退化下三峡库区贫困农户生计脆弱性评价——以重庆市奉节县为例 [J].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9, 41(4): 10-17.
- [25] 刘俊, 张恒锦, 金蒙蒙, 等. 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评估与生计策略选择——以海螺沟景区为例 [J]. 自然资源学报, 2019, 34(8): 1735-1747.
- [26] 刘恩来, 徐定德, 谢芳婷, 等. 基于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影响因素的生计资本度量——以四川省 402 户农户为例 [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5, 40(12): 59-65.
- [27] 刘春芳, 刘宥延, 王川. 黄土丘陵区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以甘肃省榆中县为例 [J]. 经济地理, 2017, 37(12): 153-162.
- [28] 吴乐, 靳乐山. 生态补偿扶贫背景下农户生计资本影响因素研究 [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6): 55-61, 153.
- [29] 赵立娟, 王苗苗, 史俊宏. 农地转出视阈下农户生计资本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 CFPS 数据的微观实证 [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9, 40(4): 612-620.